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思潮

拉丁美洲与马克思主义的“错遇”

叶健辉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中心的经验基础之上，具有浓烈的欧洲色彩。马克思本人在1857年的文章中将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视为拿破仑三世滑稽的模仿者。马克思、恩格斯一般只在涉及欧洲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关心欧洲之外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各社会主义政党也聚焦于欧洲自身的问题，很少关心欧洲之外的世界。但由于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影响到了第二国际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第二国际不得不讨论殖民地问题。为应对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荷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提出了“社会主义殖民政策”问题。1907年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与会代表就殖民地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作为阿根廷社会党代表的曼努埃尔·乌加特参与了这次会议，随后形成的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基本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拉丁美洲化的开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可以脱去其诞生时所具有的欧洲色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化 殖民政策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叶健辉，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0) 01-0067-18

马克思是19世纪的欧洲人，出生于德国，流亡于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大陆国家，最后定居于英国。马克思一生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欧洲，只是在晚年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虽然马克思自觉地要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关心整个世界的解放，但其思想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之上，具有19世纪欧洲人所具有的各种特性。传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的第二国际各社会主义政党也聚焦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所代表的欧洲，很少关心欧洲之外的世界。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浓烈的欧洲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之外的世界经历了种种“错位”，在拉丁美洲就是如此。

一 马克思与玻利瓦尔的“错位”

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马克思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曾有过交集。1857年，马克思应《纽约每日论坛报》总编辑查尔斯·达纳邀约，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词条，就这样，马克思为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立了传，这个词条叫“玻利瓦尔—伊—庞特”，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①

从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得知，1783年出生的玻利瓦尔身世显赫，是委内瑞拉一个克里奥洛（criollo，现译克里奥尔）贵族之后，在14岁时即被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曾经从西班牙移居法国并在巴黎待了几年。马克思特别指出，玻利瓦尔于1804年参加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典礼。1809年，玻利瓦尔从欧洲返回委内瑞拉。1810年，玻利瓦尔的亲戚霍塞·费里克斯·里巴斯（José Felix Ribas，1775—1815年，现译何塞·费利克斯·里瓦斯）策动玻利瓦尔参加4月19日爆发的独立运动，但遭到玻利瓦尔拒绝。此后，玻利瓦尔出走伦敦，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保护，助力委内瑞拉独立，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从伦敦回国后，玻利瓦尔再度脱离政治，直到1811年9月在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1750—1816年）将军劝说下接受卡柏略港（Puerto Cabello，现译卡贝略港）要塞司令的职务。但当手无寸铁的西班牙战俘袭击要塞时，拥有精良装备的玻利瓦尔却临阵脱逃，跑到自己的圣马特欧庄园去了。这导致要塞重新被西班牙军队占据，米兰达不得不低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5—241页。

下头于1812年7月跟西班牙人谈判，委内瑞拉因此重新受到西班牙的统治。此后，玻利瓦尔等人却以投敌叛国为由扣押了米兰达，并将这个一心一意谋求拉丁美洲独立的领袖交给了西班牙人。由于这一行为，玻利瓦尔一行得以获准离开重回西班牙统治的委内瑞拉。此后，玻利瓦尔在里巴斯的帮助下组建远征军。由于西班牙人的暴行起到了为独立招募新兵的作用，远征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逼近了加拉加斯。玻利瓦尔没有经过什么战斗便成就了拿破仑式的业绩。公众为玻利瓦尔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玻利瓦尔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者”，制定了“解放者勋章”，过着国王般的奢华生活。1813年年底，西班牙军队重新集结，再次威胁加拉加斯。1814年1月，玻利瓦尔宣称自己不愿再担执政者的重负。但配合玻利瓦尔唱双簧的一个部下强烈要求玻利瓦尔执掌最高权力，于是，玻利瓦尔的独裁成为“合法”的独裁。当我们期待大权在握的“解放者”力挽狂澜的时候，我们再次失望：1814年6月，“御驾亲征”的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军队的进攻面前，略作抵抗之后就逃回了加拉加斯，之后继续退却，于1815年5月辗转来到牙买加。留在委内瑞拉的将领们浴血奋战，提携了玻利瓦尔的里巴斯被西班牙人枪决，但玻利瓦尔运气很好，接替里巴斯的外国人路易·布里昂（Luis Brión，1782—1821年）同样大力支持玻利瓦尔，新的远征军得以建立。1816年4月，玻利瓦尔率军再次启程。但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再次遭遇中，当先头部队被西班牙人驱散时，玻利瓦尔二话不说就迅速掉头逃跑。到1818年5月底以前，玻利瓦尔这个“退却的拿破仑”打了约12次败仗。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玻利瓦尔却时来运转，得到了新格拉纳达起义者的支持和来自英国、法国等国外籍军团的援助。1820年1月，在战争由于玻利瓦尔撤走外籍军队而再度陷入胶着之际，西班牙本土爆发的革命再次帮了玻利瓦尔。1823年，玻利瓦尔既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也是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同时还是玻利维亚的教父，达到了其声望的巅峰。玻利瓦尔还以《拿破仑法典》为模板为玻利维亚制定了“玻利维亚法典”。1826年，玻利瓦尔召开巴拿马会议，企图将整个南美洲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使半个地球同玻利瓦尔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但玻利瓦尔就像拿破仑一样失败了。1830年，玻利瓦尔在试图挽回自己权力的政治计谋中突然死去。

总的来说，马克思笔下的玻利瓦尔是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玻利瓦尔在军事上有任何才能，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碰到劲敌就放弃战斗的临阵脱逃者。玻利瓦尔的胜利完全不是由于他自

己的功劳，而是由于运气或别人的帮助，特别是外籍军团的帮助。玻利瓦尔干的主要事情似乎就是参加各种凯旋仪式，发表各种宣言以及参加各种宴会。玻利瓦尔唯一的长处似乎就是其贵族出身所带有的号召力。玻利瓦尔心胸狭隘，容不得任何人挑战其最高权威的地位，时不时地干一些排除异己的勾当。尽管没有拿破仑式的天才，玻利瓦尔却渴望拿破仑式的独裁。玻利瓦尔还特别讲究排场和气派，似乎没有这些就不足以确认其存在的价值。一句话，玻利瓦尔在马克思看来是拉丁美洲的“拿破仑三世”，而不是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大体上，这就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与致力于拉丁美洲解放的玻利瓦尔之间的“错遇”。使这个“错遇”更错的是，据墨西哥学者阿图罗·查沃利亚（Arturo Chavolla），马克思的这篇篇幅并不长的词条文章有近20处事实上的错误^①。首先，马克思搞错了玻利瓦尔的名字，“庞特”是玻利瓦尔父亲的母方姓，而不是玻利瓦尔本人的母方姓，玻利瓦尔本人的母方姓是“帕拉西奥斯”，因此，马克思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玻利瓦尔—伊—帕拉西奥斯”。马克思说玻利瓦尔在游历欧洲期间在巴黎待了“几年”，但实际上只有“几周”。马克思说玻利瓦尔于1809年从欧洲回国，但实际上是1807年^②。除了这样的小错误之外，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文章中认为外籍军团特别是英国军团对玻利瓦尔所领导的独立战争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图罗·查沃利亚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西班牙方面有近10万人，而英国骑士团只有300人左右，不可能在对阵10万西班牙大军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③。应该说，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错过”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二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拉丁美洲

就像不看重玻利瓦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也不看重拉丁美洲。在《1847年的运动》一文中，恩格斯这样谈论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

^{①②③} Arturo Chavolla, *La Imagen de América en el Marxismo*, Saarbrücken: Editorial Académica Española, 2011, p. 12, p. 18.

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其自身发展利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这是符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的。”^①

就像《共产党宣言》肯定资产阶级用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这门重炮”“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一样，在这里，美国对墨西哥领土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吞并是在将墨西哥带入“进步的历史潮流”。或者说，美国代表“文明”，而墨西哥则代表“野蛮”，“文明”对“野蛮”的“监护”是正当的，因为这是将“野蛮人”从“长城”的封闭中解放出来，使之融入历史，从而获得“发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这里表述的观点接近差不多同期马克思关于英国人征服印度的观点。一方面，马克思对印度人遭受的苦难深感情：“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②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样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③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服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德准则。不管人们心理上喜不喜欢，接不接受，在历史中存在着“必然性”这样一堵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3页。

^{②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第683-684页。

感情撞不倒的“墙”。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篇反对巴枯宁观点的文章中，恩格斯说：“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谴责美国人进行的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坏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①

历史中存在着与通常所理解的“正义和人道”相冲撞的“必然性”，虽然不讨人喜欢，但很不幸，文明就是在这种必然性的驱使下前进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人会受到侵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虽然很残酷，但按照晚年恩格斯的说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②。《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还将美国人与墨西哥人之间的关系同历史上的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关系对举：“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指斯拉夫人）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与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娇嫩的民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6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页。

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上述斯拉夫人所犯下的‘罪行’，原来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原来是中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自己历史上可以夸耀的行为。”^①

与美国将墨西哥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将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解放出来符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类似，在这里，德国人将斯拉夫人纳入自己的国家也符合“文明的利益”，是“值得感激的行为”。恩格斯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条件，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之外，其他斯拉夫人是没有前途的，这些斯拉夫人不是“历史的民族”，而是“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没有生命力的民族”，没有获得独立的可能性^②。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具体指出，“垂死的捷克民族……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③。与此对应，看起来，“懒惰的墨西哥人”也只能在“精力充沛的美国佬”的“监护”下生活。马克思在1854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相比盎格鲁—萨克逊人，西班牙人是“退化了的”，而墨西哥人则更糟，是“退化了的西班牙人”。^④

大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墨西哥人或一般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人的看法可以用鲁迅对阿Q的看法来概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波兰人由于积极投入1848年革命而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成为斯拉夫人的例外一样，墨西哥也会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1806—1872年，或译胡亚雷斯）执政时期的墨西哥就是这样，“懒惰的墨西哥人”这样“没有历史的民族”并不是非得在西方“历史的民族”的“监护”下生活，西方“历史的民族”的干涉并不总是符合“文明的利益”，西方“历史的民族”也有可能成为“反动的民族”。马克思在1861年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涉》中就严厉批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是“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⑤但总的来说，

^{①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3页，第328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9—400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15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8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焦点是欧洲，不怎么关心拉丁美洲，一般而言，只有在跟欧洲发生关联时，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关心拉丁美洲等欧洲之外的世界。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奠基人与拉丁美洲的“错遇”。

三 第二国际眼中的殖民地问题

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特别是它的重要支柱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承者。跟马克思、恩格斯类似，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关注的焦点也是欧洲事务，没有专门讨论过拉丁美洲问题，但跟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讨论非欧洲问题一样，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或多或少跟拉丁美洲有关的殖民地问题。第二国际之所以要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原因非常实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会影响选举，影响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在1904年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1907年于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殖民地问题则成为引起激烈争论和交锋的焦点问题。

由于曾经长期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亨利·范科尔(Henri van Kol, 1852—1925年)^①是第二国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权威，范科尔也是第二国际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主报告人。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范科尔已经提出，社会主义者不能一味消极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有必要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政策”，“以一方面制止对殖民地人民的犯罪，另一方面减轻殖民政策对宗主国无产阶级的负担，降低它对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腐化影响”^②。这个积极的殖民政策就是在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由范科尔等人组成的第二国际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多数派提出了如下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

“大会认为，一般来说，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殖民地的好处或必要性被大大夸大了。但是，大会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拒绝任何一种在社会主义

^① 殷叙彝等学者将这个名字译为万一科尔，参见殷叙彝等著：《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何瑞丰先生将这个名字译为范·柯尔，参见[英]G. D. H. 科尔著，何瑞丰译：《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0页。

^②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制度下可能促进文明的作用的殖民政策。

大会重申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并再次摒弃现在的殖民方法。这种殖民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的，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征服别国人民和奴役别国人民，以便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对他们进行残酷剥削，而同时在本国加重无产者的负担。

大会反对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保护一切被压迫者——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因此大会谴责这种掠夺和征服的政策，它只是强者的权利的无耻行使和对战败国人民的权利的践踏。

殖民政策加大了占有殖民地的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加重了这些国家的陆海军军费负担。

从财政方面来看，凡殖民地支出，包括帝国主义造成的支出以及为发展殖民地经济所需的支出，应当完全由那些从掠夺他国中捞到好处并从中搜刮财富的人来负担。

大会最后宣布，社会党议员责无旁贷地应在一切议会中同上述种种在现有的一切殖民地里盛行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的方法作斗争。

为此目的，他们必须支持改善土著居民命运的改革，必须制止任何侵犯土著居民权利的行为，制止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和奴役。他们必须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教育土著居民争取独立。

为此目的，社会党议员应当向他们的政府建议缔结一项国际条约，以实现殖民地的权利。这项国际条约将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他们的权利还将得到缔约国家的相互担保。”^①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格奥尔格·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1947年）等人组成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少数派则要求删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并将原第一段改为：

“大会认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必然导致对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

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促进文明的使命，只不过是用来掩盖征服和剥削欲望的外衣。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一切民族提供充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

^①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38—139页。

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不是提高集体生产力，而是通过奴役土著居民和使他们贫困化，以及通过生灵涂炭的毁灭性战争，破坏它把自己的方法植入的那些国家的自然财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甚至延缓或阻碍着文明国家的工业品的贸易和销售发展。

大会谴责资本主义的野蛮殖民方法，并要求为了发展生产力实行一种保障和平的文化发展以及使地球的矿藏为全人类的高度发展服务的政策。”^①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范科尔决议案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在范科尔看来，累德堡等人提出的替换第一段的内容属于消极的反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豪言壮语”，不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者的行动，这样“漂亮的演说”只适合年幼的社会党，随着时势的变迁，社会主义者需要通过成熟的政策、通过实际行动而不是漂亮的空话来反对资本主义，或者说，需要“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②。范科尔决议案的第一段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说，殖民地的存在对宗主国无产阶级没有那么重要。言下之意，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享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福利根本上是欧洲人自己奋斗的结果，不靠本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这明显是在针对这种观点：欧洲工人阶级实际上得益于欧洲统治阶级从殖民地攫取的利益，或者说，欧洲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成就是欧洲统治阶级用一部分取自殖民地的利益收买的结果。第二句是说，不能不加分辨地反对所有殖民政策，殖民本身并非“先验地”就是残酷的，也有可能存在“促进文明”的殖民。现实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给殖民地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这并不表明殖民本身本质上一定是这样。欧洲社会主义者不能只是一味地谴责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而应该积极地着手改善殖民政策，使殖民起到“促进文明”的作用。或者说，不能让资产阶级主导殖民进程，因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社会主义者应当通过自己的殖民政策主导殖民进程，促进文明在殖民地世界的发展。

范科尔为此提出的一个理论上的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在欧洲是这样，在殖民地世界也是这样。^③历史是阶段性发展的，“在能够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之前，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必然的”“从野蛮状态不可能跃进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处于野蛮状态的殖民地世界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能走向社会主

^{①②③}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39-141页。

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代表历史的“进步”。由于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发展伴随着“恐怖暴行”，社会主义者有责任积极干预殖民政策，缓解人间苦难^①。范科尔提出的一个政治上的理由是：要今天的欧洲放弃殖民地是不现实的，口头上反对殖民并不能阻止殖民地的现实存在^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年）赞同范科尔的观点，也认为要欧洲抛弃殖民地就如同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一样是一个“乌托邦”^③。范科尔还指出他自己拥有在殖民地生活的经验，他所提出的决议案有经验上的基础。范科尔决议案的最后一段则实质性地指出了其所说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方向：通过缔结宗主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来保障殖民地的权益，也就是说，通过实际的“法律”手段来改善殖民地的社会状况。这实际上意味着，殖民地人民需要在代表“文明”和“进步”的欧洲人的“监护”下生活。

范科尔还用一个假设的例子表明殖民地人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发展：“如果我们现在把一部机器送给中非的野蛮人，他们会用它来做什么呢？也许他们会为此而跳一场圆舞，或者在他们的大量偶像中又会增加一个新的偶像。也许我们还应该把操纵机器的欧洲人送到那里去。……也许土著居民会把我们的机器砸毁，也许他们还会把我们杀死，或者，甚至吃掉。……当我们欧洲人带着工具和机器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没有保护的牺牲品落到土著居民手里。因此我们必须手持武器到那里去。”^④

在这里，殖民地人民处于某种封闭的、自然性的“野蛮”状态之中，欧洲人如果要把机器所代表的“文明”带到殖民地世界，就必须用武器保护自己，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向前推进。相反，殖民地世界广阔而富饶的土地在殖民地人民手中不能变成人类历史的财富，殖民地人民需要在武装的欧洲人的帮助下为人类开垦土地所蕴藏的生产力。就此问题，爱德华·伯恩斯坦也说：“开化的民族对未开化的民族实行一定的监护是社会党人也应承认的一种必要性”，因为“土地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而是属于人类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为了人类的利益管理好它”。^⑤也就是说，土地并不是属于土著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原则上，谁能把土地开发得更好，土地就应该是属于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个代表爱德华·大卫（Eduard David, 1863—1930年）说得更加明确：“把殖民地归还给土著居民，那时在殖民地会出现什么情

^{①②③④⑤}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第142页，第145页，第158页，第145页。

况呢？人道将不会在殖民地起支配作用，它们会重新回到野蛮状态。”^①在此，殖民进程等于人道化进程，如果没有殖民，殖民地人民将与人道无缘，永远陷于“野蛮”的死循环之中，殖民于殖民地人民是一种应该感激的解放。

累德堡方面首先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经常通过议会和报刊等渠道积极批评和监督殖民活动，尽可能减少殖民冒险给本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造成的“祸害”，多次实际地干预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是少数党，其在殖民政策上的立场还起不了作用，要在这个问题上制定纲领还需要谨慎讨论。具体而言，累德堡反对范科尔决议案第一段的理由是：这一段实际上承认原则上殖民地对工人阶级也有用，虽然它反对夸大这种作用。累德堡从根本上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殖民活动不仅对殖民地人民是灾难，对宗主国工人阶级也是一种“祸害”，会加重其负担。另外，就范科尔决议案的最后一段，累德堡表示“坚决拒绝对其他民族实行监护”^②。

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卡尔斯基（即尤·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1866—1925年）特别表示反对范科尔决议案的最后一段。首先，卡尔斯基指出，就像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因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几乎无从谈起”一样，“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同样是“几乎无从谈起”的。卡尔斯基还说，他作为波兰人，理解俄国沙皇和普鲁士政府的监护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不能指望通过殖民宗主国缔结国际条约、相互担保来保障殖民地人民的权益。另外，卡尔斯基还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阶段，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切民族的必然前提”。历史并不是单线演进的，欧洲之外的世界有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对社会党人来说，还有另一种文化，而不只有资本主义的和欧洲的文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炫耀我们的所谓文化，并把它强加给拥有自己的古老文化的亚洲人民。”^③也就是说，欧洲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世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代表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年）也认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思想”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不但起不到传播文明的作用，反而会阻碍文明的发展，因为殖民意味着控制和征服，意味着“异族统治”，会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信任和抵抗；必须赢得殖民地人民的信任，而要赢得

^{①②③}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第146-147页，第151页。

这种信任，就必须给殖民地自由。殖民在理论上还意味着“有些民族是孩子，不能自己管理自己”，这也正是美国奴隶主反对解放奴隶的依据。美国奴隶主认为“如果奴隶制度废除了，这个国家就要回到野蛮状态”，考茨基说社会主义者不能接受这种逻辑^①。

最后提交大会表决的是略加修改后的累德堡等人的“少数派”修正案，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表决的结果是：127票赞成，108票反对，10票弃权^②。也就是说，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上，有108票（占总票数的44%）支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而在第二国际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以荷兰人范科尔等人为代表的支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社会主义者是“多数派”。即使是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累德堡、考茨基等人也很少考虑殖民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殖民地人民基本上是解放的对象而非解放的主体。今天看来，唯一真正的例外只有波兰人卡爾斯基。可以说，这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殖民地世界的“错位”。

四 曼努埃尔·乌加特与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化

拉丁美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因为拉丁美洲各国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获得政治独立。因而，第二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争论跟拉丁美洲没有直接关系。但毕竟拉丁美洲曾经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而且当时的古巴实质上处于美国的“监护”之下。尤为重要的是，有一位拉丁美洲人参加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会议和斯图加特会议，聆听了第二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和争论，这就是后来在拉丁美洲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1875—1951年）。

曼努埃尔·乌加特是一位年少成名的阿根廷诗人，于1903年发表了题为《世纪观念》（*Las ideas del siglo*）的演讲，盛赞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命的胜利”，最后号召“让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③。之后不久，曼努埃尔·乌加特加入了阿根廷社会党并作为阿根廷社会党代表驻留欧洲多年，期间参加了第二

^{①②}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第160页。

^③ Manuel Ugart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p. 192.

国际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会议。1908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会议结束之后大约1年，曼努埃尔·乌加特在阿根廷社会党机关报《先锋》（*La Vanguardia*）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祖国》（*Socialismo y Patria*）^①一文。在该文中，曼努埃尔·乌加特首先指出，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是空洞的，因为这些决议要求无差别地应用于情况迥异的各个国家。这是不现实的，因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与祖国是否相容的争论。或者说，第二国际所要求的国际主义会遇到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问题。由此，曼努埃尔·乌加特问道：“我们应该成为反爱国主义者吗？”他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成为自己民族传统的反对者。

曼努埃尔·乌加特的这个回答实际上标志着拉丁美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族化或拉丁美洲化问题。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提出了取消国家、种族等界限的必要性，但曼努埃尔·乌加特认为，这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还没有进化到那个阶段。因为人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个群体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分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者不能无视这个基本的历史现实。在一个民族遭到入侵的时候，要这个民族低头屈服于入侵是不可思议的。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要超越这种历史的自然演进所造就的文化天性是徒劳的。但社会主义者应该无条件地支持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吗？

在此，曼努埃尔·乌加特区分了两类爱国主义，一类是低劣的爱国主义，另一类是“高超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o superior*）。第一类爱国主义有三种，第一种是“粗陋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o bruto*），这种爱国主义以血腥压制其他民族、扩张本民族统治为特征；第二种是“傲慢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o orgulloso*），这种爱国主义视本民族高人一等，甚至欣赏本民族的缺陷，鄙视外来的一切；第三种是“祖传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o ancestral*），这种爱国主义源自野蛮的遗存，等于部落本能或群体本能。曼努埃尔·乌加特反对这类狭隘、低劣的爱国主义，但他特别指出，还有一类能够与现代观念相协调的爱国主义，这种独具一格的爱国主义强调反对外国干涉，捍卫本国自主，捍卫本国人民的自由处置权，捍卫本国人民选择良善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权力。

^① Manuel Ugart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pp. 197 - 198.

曼努埃尔·乌加特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后一类爱国主义，同情南非人反对英国人的斗争，支持阿拉伯人反对法国入侵的斗争，赞赏波兰重新统一失散国土的努力。关于拉丁美洲，曼努埃尔·乌加特则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捍卫拉丁美洲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扩张的斗争。他在《社会主义与祖国》一文最后说，社会主义与祖国不是互相敌对的敌人，因为祖国可以意味着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而社会主义则渴望实现每个国家内所有公民的平等，社会主义的渴望可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实现之后变成现实。虽然《社会主义与祖国》一文没有明确提及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上发言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斯基，但曼努埃尔·乌加特关于“高超的爱国主义”的看法非常接近卡尔斯基的看法。就像卡尔斯基反对普鲁士或俄罗斯对波兰的“监护”一样，曼努埃尔·乌加特也反对英国或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监护”，他们都在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自主的发展道路而辩护。

但就像卡尔斯基的观点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上犹如空谷足音一样，曼努埃尔·乌加特在阿根廷社会党内也是形单影只。由于曼努埃尔·乌加特与阿根廷社会党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他最终被阿根廷社会党开除出党，而导致他被开除党籍的触发点是“哥伦比亚事件”。事件起因是1913年阿根廷社会党机关报《先锋报》在哥伦比亚独立纪念日（7月20日）刊发的一篇文章。曼努埃尔·乌加特认为该文观点和措辞很成问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做出更正。他尤其不满该文最后一段对哥伦比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评论：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像所有其他南美国家一样，长期以来为内战所困扰，巴拿马则很可能有助于哥伦比亚的进步，使之迈入文明繁荣民族的行列^①。曼努埃尔·乌加特认为，在哥伦比亚纪念其独立的重要时刻，以这种方式谈论哥伦比亚的历史，是对值得高度尊重、有着光荣历史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冒犯。由于巴拿马曾经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是在美国的干涉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去的，因而，说巴拿马有助于哥伦比亚成为一个“文明”的民族，无异于往哥伦比亚的伤口上撒盐，实际上暗含着肯定美帝国主义分裂哥伦比亚行径的意思：“美国策动的巴拿马独立消除了哥伦比亚‘野蛮’的内战，使哥伦比亚走上了‘文明’的康庄大道”^②。这极有可能让曼努埃尔·乌加特想

^① *Manuel Ugarte y el Partido Socialista*, Buenos Aires: Unión Editorial Hispano - Americana, 1914, pp. 27 - 28.

起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上荷兰人范科尔关于“殖民可以促进文明”的说法。对于坚持拉丁美洲自主发展权的曼努埃尔·乌加特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更令曼努埃尔·乌加特不满的是，《先锋报》没有刊发他的信，这进一步引发了其对阿根廷社会党在组织管理方面的批评。曼努埃尔·乌加特的这封信发表在了另一份不由阿根廷社会党掌控的报纸《民族报》上。

对此，《先锋报》方面刊文给予回应。《先锋报》首先指出，它对哥伦比亚状况的判断是基于哥伦比亚官方统计数据，有着坚实的基础，能够有力地说明哥伦比亚确实处于“可悲的落后状况”之中，并没有贬低哥伦比亚的意思，而是衷心希望哥伦比亚能够走上文明繁荣之路。^①而关于拉丁美洲的一般状况，《先锋报》则援引阿根廷社会党主要创始人胡安·包蒂斯塔·胡斯托（Juan Bautista Justo, 1865—1928年）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一书对比“两个美洲”的差异：在农业方面，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每一个农民都有其必要的耕地，而南美却还是大土地领主所主导的大陆；在工业方面，美国已经生产出第一艘可航行四海的蒸汽船，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墨西哥的独裁者圣安纳却在抵制墨西哥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因而，在19世纪中期，繁荣的北美文明仅凭两次小小的军事冒险就能夺取墨西哥大片领土，而这丝毫也不令人意外。美国夺走的不是墨西哥人民的土地，而是统治墨西哥的寡头集团的土地。阿根廷社会主义者不能成为拉丁美洲寡头集团的辩护者，因为寡头集团正是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苦难的罪魁祸首。用“美帝国主义”这样的“稻草人”并不能挽救拉丁美洲人民免于内部暴政和外部压力^②。也就是说，《先锋报》认为，曼努埃尔·乌加特所诉诸的与“美帝国主义”相对的拉丁美洲“高超的爱国主义”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为拉丁美洲寡头集团辩护。因为“美帝国主义”并非问题的根源，在此，诉诸诗人的“感性辞藻”不能成事，相反地应该看到，“伟大的北美人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是唤醒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这样才能制止北美资本主义的扩张。而阿根廷社会党多年来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此，并日渐取得成效。《先锋报》最后诉诸《共产党宣言》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

曼努埃尔·乌加特则坚持民族问题的优先性，认为在哥伦比亚独立纪念

^{①②③} Manuel Ugarte y el Partido Socialista, Buenos Aires: Unión Editorial Hispano - Americana, 1914, pp. 29 - 31, pp. 31 - 32, pp. 33 - 34.

日这样的时刻，说“哥伦比亚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之中，处于野蛮之中”是不合适的、失礼的，不是促进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两国友好的方式。曼努埃尔·乌加特强调，不应该忘记有“高超的文化情感”这种东西的存在，不能以宗派主义的不宽容态度对待这种情感。他指出，《先锋报》提到的统计数据并不是贬低哥伦比亚的充分理由，因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问题，而关于反对铁路建设不仅在墨西哥发生，法国人也曾反对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并将其称为“幼稚的玩具”。就像不能由此将法国称为“野蛮的国家”一样，也不能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称为“野蛮的国家”。导致阿根廷社会党发表这种无礼评论的根源在于其“永恒的反爱国主义暗疮”。也就是说，在曼努埃尔·乌加特看来，阿根廷社会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爱国主义”立场。他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阿根廷社会党人跟他说“皮肉比旗帜更可爱”，而他的回答是：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独立不是用皮肉换来的，而是在旗帜的指引下取得的。曼努埃尔·乌加特讽刺阿根廷社会党自以为创造了至关重要的理论，但其实不过是在拙劣地移植欧洲多年以前流行的东西，并强调自己才是在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①。

一方强调“皮肉”所代表的实际利益的优先性，另一方则强调“旗帜”所代表的民族情感的优先性，这鲜明地展示了阿根廷社会党以阶级为中心的视角和曼努埃尔·乌加特以民族为中心的视角之间的分歧。阿根廷社会党方面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比爱一小块土地更重要的是爱整个人类”^②，曼努埃尔·乌加特不过是出于“诗人的虚荣”而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③。曼努埃尔·乌加特则认为，国际主义是一个壮丽但遥远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是民族的”，我们固然应该声援世界上所有反对不义的斗争，但我们不能幻想自己生活在别的时代，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时代，去追逐还不属于我们时代的幻想^④。双方的分歧无可弥合，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最后，曼努埃尔·乌加特于1913年11月宣布脱离阿根廷社会党，并再次声明民族问题的优先性，认为阿根廷社会党走在危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不应导致“民

^① Manuel Ugart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pp. 203 - 205.

^{②③} Manuel Ugarte y el Partido Socialista, Buenos Aires: Unión Editorial Hispano - Americana, 1914, p. 61, p. 45.

^④ Manuel Ugart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p. 201.

族自杀”^①。

曼努埃尔·乌加特脱离阿根廷社会党的“宣言”特别谈及阿根廷社会党反军队、反宗教、反财产和反祖国四个问题，认为阿根廷的社会主义不应反对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繁荣的保障；不应反对宗教，因为这是人民的信仰；不应反对财产，因为财产也是对劳动的报偿；不应反对祖国，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和她的旗帜”^②。曼努埃尔·乌加特特别指出，阿根廷社会党曾经要求欧洲国家的工人配合阿根廷工人与统治阶级的斗争，要求他们抵制阿根廷出口到欧洲的产品，拒绝卸载阿根廷货物，迫使阿根廷产品返回阿根廷^③。为此，阿根廷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否决曼努埃尔·乌加特的退党要求，并以他曾与人决斗而违反党章等为由将其开除出党^④。阿根廷社会党方面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返祖现象^⑤，用取消军队、宗教和财产来指责社会主义者则是统治阶级的惯用伎俩，统治阶级正是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劫掠劳动人民^⑥。关于“抵制阿根廷货”问题，阿根廷社会党解释说，那是当时阿根廷社会党内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所为，他们已经于1906年被开除出阿根廷社会党^⑦。

被开除党籍的曼努埃尔·乌加特与阿根廷社会党由此分道扬镳，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拉丁美洲化尝试就此告一段落，但曼努埃尔·乌加特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必须民族化”理念无疑为后来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和解放神学都可以看作曼努埃尔·乌加特在1908年的《社会主义与祖国》中首次表达的社会主义拉丁美洲化倡议的继承者。

（责任编辑 黄念）

^{①②③} Manuel Ugart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p. 208, p. 213, p. 209.

^{④⑤⑥⑦} *Manuel Ugarte y el Partido Socialista*, Buenos Aires: Unión Editorial Hispano - Americana, 1914, p. 95, p. 96, p. 113, p. 123.